



□李 萍

“业精于勤，荒于嬉”的启示

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，与柳宗元并称“韩柳”，有“文章巨公”“百代文宗”之名。其文章气势雄伟，说理透彻，逻辑性强，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首。韩愈不但精通文学，熟悉文学表达的各种惯例与修辞手段，而且在经学、史学、诸子学等领域亦有很深的造诣，在当时可谓是“百科全书式”的学者，开创了独树一帜的韩孟诗派。

行成于思

韩愈3岁时便成了孤儿，由其兄抚养。因为孤苦，韩愈从小便刻苦向学，无须别人嘉许勉励。他7岁言出成文，13岁就能写一手好文章，19岁至京师长安。然而，3次参加科考失利，直至24岁时终登进士第。“业精于勤，荒于嬉；行成于思，毁于随”。这句千古名句出自韩愈的《进学解》，意为学业由于勤奋而专精，由于玩乐而荒废；德行由于独立思考而有所成就，由于因循随俗而毁败。韩愈所说的“业”，指读书、习文。而“行”，指行事、立言。这是韩愈强调的学者主观修养的两个重要方面。在他看来，读书习文，必须勤奋刻苦、心无旁骛，始终精力充沛、专心致志，把声色犬马、游戏玩乐置之度外，而一旦沉湎于嬉戏，学业必定荒废，定会闲白少年头！韩愈生活于中唐时期，一生仕途不畅，但才识俱佳，敢于直言。他最大的成就不是官职、不是政绩，而是领导了唐代中期掀起的古文运动。白居易说韩愈“不交势利，自致名望”。苏东坡赞之：“文起八代之衰，而道济天下之溺”。毛泽东对韩愈《师说》《进学解》等文章里体现的教育原则、教育方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：“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，写文学史不可轻视他。”

德才兼备

《进学解》是韩愈文章中的名篇，行文活泼多变，语言隽永简练。更重要的是，《进学解》阐述了对人生学业和培养德才兼备人才的主张，以师生对话的方式，讲解自己治学和修德方面的经验，劝告学生怎样读书学习、取得学业和德行进步。韩愈一

生热心于教育事业，他曾两次任国子博士，一次任四门博士。韩愈认为教育之就是要使受教育者明先王之教。如在《原道》中说：在德育方面，教育之内容包括仁义道德；在智育方面，包括《诗》《书》《易》《春秋》；在政治教育方面，包括礼、乐、刑、政。韩愈极力主张使受教育者继承与发扬儒家的“道统”。认为教育对上品的人和中品的人是起作用的，对上品的人来说，“就学而愈明”；对中品的人来说，“可导而上下”；至于对下品的人则是“畏威而寡罪”，即用刑法来统治，使他们畏惧而少犯罪。

学业勤勉

韩愈在《进学解》中重点阐述了学业和德行的意义、治学和修德的方法以及学业与社会、学业与前途的关系。中心内容是学业要勤，这是韩愈一贯的主张，他有一副治学名联：“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学海无涯苦作舟。”韩愈自己就是勤奋学习的典范，为我们刻画了一个勤勉刻苦、孜孜不倦的读书人形象，“先生之业，可谓勤矣”。学业要勤，首先是充分利用时间，“焚膏油以继晷，恒兀兀以穷年”。白天时间不够用，就要把晚上的时间利用起来，而且一年四季，长期坚持不懈，绝不可“三天打鱼、两天晒网”。时间对于每个人都是平等的，而每个人利用时间却是不平等的。古往今来，凡是学业有成的人，都是刻苦学习、珍惜时间、终身勤勉，既利用白天，又利用晚间休息时间。那些把业余时间用在消遣玩乐的人，在学业上肯定一事无成。学业要勤，须多读书读好书，口中不断地诵读六经的文章，手里不停地翻阅诸子百家的著述。没有牢固的基础，就不可能有大厦高耸。这个基础就是读更多的书，学更多的知识，融会贯通，自成一家。学业要勤，还须口手并用、眼到心到。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”。只学习却不思考，就会感到迷茫而无所适从，只思考而不学习，就会疑惑而无所所得。因此，韩愈强调“记事者必提其要，纂言者必钩其玄。贪多务得，细大不捐。”意思是，对于记载史事的经典一定要摘取其中的要点，对于编纂言论的书籍，一定要探索其中深奥的道理。勤

奋地学习，才能有所收获。无论大小学问都要钻研，丝毫不可放弃。主张读书要严肃认真，需要诚实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。韩愈曾在《游骹》里说：“呜呼余乎！其无知乎！君子之弃，而小人之归乎？”意为忘了学习，就脱离了君子之道，离小人也就不远了。坚持学习亦是坚守君子之道，有坚持才有思考，有思考才能辨明是非曲直，明是非才可免于随波逐流。而一旦放弃勤奋学习，就急于思考，因而就不会再有行动了。

德行双修

韩愈认为，德行双修是对学校和老师的根本要求，学校和老师的职责是既要向学生传授知识，又要教育引导学生做人。既要学习知识技能，又要学习为人处世。学业和德行两者须臾不可分割，必须有机结合，否则，就是教育的失败。韩愈对此的认识非常清醒，在《进学解》中，他强调学生要“业精于勤”“行成于思”，在另一篇名作《师说》中，明确提出：师者，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。传道是对学生德行的培育，受业是对学生知识的传授，解惑则既解决学生在人格塑造过程中遇到的困惑，又解决学生在学习掌握知识技能方面遇到的疑问。韩愈不仅是这样认识的，也是这样实践的。作为学者，他既做事，又做人，堪称楷模；作为老师，他训诫学生要学业和德行双修，正确对待学业与社会、学业与前途的关系。提出任何学子都关心自己的前途，希望通过读好书、学好业、修好行，未来得到重用，对社会有所贡献。但是一个人是否能够实现志向，是否有好的前途，是个人与社会综合作用的结果。应注重打牢学业和德行的根基，不应患得患失，不应过分关注社会环境和个人前途。“诸生业患不能精，无患有司之不明；行患不能成，无患有司之不公。”意思是学生们只需考虑学业能不能精通，不需担心社会不了解，只需考虑德行有没有成就，不必担心社会不公平。在政治清明时期，不需要担忧学业、社会和前途的问题。圣贤贤臣相逢，法令都已健全，除掉了凶恶奸邪的人，提拔德才兼备的人，有长处的人都能得到录用，有一技之长的人也会受到重用。

范式的信用

□ 吉炳伟

《后汉书·范式列传》记载，范式年轻的时候，与张劭同在洛阳读书，两人志趣相投，感情很好，学成后他们准备回家，分别时依依不舍。范式对张劭说：“后二年当还，将过拜尊亲，见孺子焉。”兄弟，两年后的今日，我一定去你家拜望老人，与你聚会。两年的时间很快过去，二人的约期眼看就要到了。张劭就让母亲准备酒菜，打算好好招待范式。张劭的母亲劝他说：“二年之别，千里结言，尔何相信之审邪？”山阳（范式的老家）郡离咱家有一千多里地，而且又过了这么久，他不一定会来的。张劭却肯定地对母亲说：“巨卿信士，必不乖违。”范式是个极为守信的人，他一定会来的。张劭的母亲看到儿子对范式如此信任，就去准备酒

菜了。等到了二人约定的那天，范式果然如期而至，没有忘记当年许下的诺言。

这段简单的文字阐述了一个不简单的道理，通过范式和张劭的交往，赞扬了重承诺、守信用的优良品格。对于范式和张劭的约定，张母表示怀疑，这是很正常的，一般人都不相信。张母不相信的理由也能理解，一是两年前的约定，时过久远；二是范式的家远在千里之外，路途遥远。换作其他人，即便是平时守信用，也会因种种困难和理由放弃，结果范式做到了。范式和张劭都是了不起的人物，范式不顾千里之遥，来实现两年前的承诺，是一种美德，值得称赞；张劭能信任范式，对其赴两年之约深信不疑，同样是一种美德。他们两人

的共同品质就是“诚信”，他们两人之所以能成为好朋友，最为重要的根基也是诚信。我相信，我们每一个人遇到这样的朋友，都会很感动和珍惜的。

孔子《论语》中有一句话：“古者言之不出，耻躬之不逮也。”就是古代的君子从不轻易地发言表态，他们以说了而做不到为可耻。在孔子的眼中，做人应当谨言慎行，不要轻易对他人作出许诺。若是做不到的话，很有可能会失信于人，影响到自己的威信。“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
现实生活中，许诺是常有的事，而能否兑现曾经许下的诺言，则是一个是否讲信用的主要标志。孔子的话讲得很明白，当你要允诺别人某件

事情的时候，一定要三思而行。对方若是没有得到你的许诺，心里就不会有希望，更不会充满期待地等待下去，失望也就不会有了。你若是许下了承诺，就好比在对方的心里播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，指望着他能帮他实现自己的愿望。一旦你没有履行承诺，对方的希望落了空，那给对方带来的打击是很大的，以后对方可能再也不会相信你了。试想，如果范式没有如约而至，那么张劭肯定会很失望的，张劭与范式的友谊就不会存在了，《后汉书》上也不会留下他们诚信的美名。

信用故事



“微操”一词来源于近20年兴起的电子竞技项目，指精细而连贯的细节把控。良好的微操可以使参赛选手掌控局部形势，从而左右全局走向。天下大事，必作于细。如果把这个概念引入中国古代的军事历史中，会发现决策者精准的“微操”往往是成败的关键因素。方略既定，全局在胸、细处着手，算无遗策、丝丝入扣，才能把运筹帷幄变成决胜千里。就如汉朝在与南越的战争中忽视了“微操”，结果付出了额外代价。

北胡南越

公元前117年，汉武帝年届不惑，北方大事已定，汉朝雄姿威立。人生不满百，逝者如斯夫，分秒当自珍。汉武帝加快了巩固国家根基的步伐，同年“遣使巡行郡国”，完成了一次大摸底；公元前113年，汉武帝又亲自“始巡郡国”。南越从秦末以降，自治近百年，在此大背景下，到了解决问题的窗口期。

天下英雄，所见略同。秦始皇为了巩固天下，蒙恬扫北，屠雕镇南，外张内安，以为帝国屏障。汉厚积薄发，至武帝大成，卫霍之军重拳频出，匈奴“漠南已无王庭”；张骞两次出使西域，开拓万里“丝绸之路”，汉朝的西、北两大战略方向都逐渐平静下来。北胡南越，皆为隐患，南越更甚，看似“软柿子”，实为“橡皮糖”。

公元前181年，汉军进攻南越，因军中流行瘟疫，未能如愿。此后，南越乘机又曾与东面的闽越联合，威势更盛，甚至主动攻打汉之长沙国。南越开国之主赵佗死后，汉、越关系逐步改善，南越国太子赵婴齐赴长安充当“宿卫”，长达12年之久，“亲汉”取向自然而然。赵婴齐继位后，立汉女繆氏为皇后，还“废长立幼”，把繆氏所生幼子赵兴立为太子。公元前113年，赵婴齐去世后，亲汉色彩更加浓重的赵兴为南越王，这是汉朝收服南越的大好时机。

刚柔相济

汉朝事先进行了精心谋划，决定文武兼备、软硬兼施。一方面，组织精干使团，说服南越“比内诸侯”，真正服从汉朝中央政府管制。另一方面，汉军集结精兵猛将，进驻桂阳，名义上是等待入朝觐见的南越使者，实质上是引而待发，以武力震慑南越，并随时策应汉朝使团。

汉武帝对此次行动高度重视，文武之才皆是一时之选，刚者至刚，柔者至柔。卫尉路博德被任命为前军统帅，他曾随霍去病北征匈奴，实战经验丰富，可谓当世晓将。对于使团成员，汉武帝更是三思而定，正使安国少季，与南越繆氏太后少年相识相知，可以晓之以理、动之以情；副使终军是汉武帝身边近臣，血气方刚，既是饱学之士，又能言善辩，曾经自请出使匈奴，此次又主动出使南越，表示“愿受长缨，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”；副使魏臣是勇猛力士，作为辅助，可壮声威，关键时刻还能精准“点射”。如此黄金组合，为出使南越做了充分准备，志在必取。

失之于细

汉朝精心策划收服南越策略，在实施阶段却不重细节，“微操”几番失误，诱发出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，导致事态失控，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。

一是主次不明、激化矛盾。汉朝使团把主攻方向锁定在南越王赵兴和繆氏太后，认为能以上率下，一通百通。然而，南越国中汉、越两股势力相互交织，第三任南越王赵婴齐的长子赵建德为越女所生，但只封为沭阳侯，未能继承大统，越族耿耿于怀。当时吕嘉为南越丞相，他是三朝老臣，又是本土势力首领，家族成员数十人占据重要岗位，还与地方藩王暗中勾连，耳目遍布朝野，“得众心愈于王”，是南越实际的操控者。吕嘉不仅不愿归汉，而且一直希望拥戴越人血统更浓的赵建德为王。主要矛盾是吕嘉为首的本土势力，汉朝使团说服了南越王和太后，并不是大功告成，

汉朝对南越的「微操」之误

□ 崔 庆

而是彻底撕裂了南越国内两派，微妙的平衡被打破。

二是当断不断、反受其乱。汉朝使团来访成为催化剂，使原本的暗流汹涌迅速激化成表面的剑拔弩张。为了尽快解决问题，南越繆氏太后最为果决，在宫中设宴，隆重款待汉朝使团，准备先发制人、击杀吕嘉，但如此重大行动居然没有和汉朝使团事先沟通。吕嘉虽然前来赴宴，但早有防备，其弟吕正领军守卫宫门之外。席间繆氏太后当面指责吕嘉不服汉廷，汉使安国少季忧虑吕氏势大，犹豫之间没有给予繆氏太后强力支援。关键时刻，汉朝使团和南越王廷没有拧成一股绳，“鸿门宴”虎头蛇尾，吕嘉从容全身而退，埋下了祸端，本土势力的叛乱准备骤然提速。

三是轻敌冒进，策应迟缓。战术误判会导致战略落空。汉武帝得知前方情况后，认为汉使优柔寡断，有南越王和太后做内应，即使吕嘉作乱，也难成气候，不值得发大军征讨，只打算派遣庄参带领两千人去加强使团力量。庄参顾虑并谏言，如果交好南越，数人足矣；如果武力征服，两千人恐怕是杯水车薪。忠言逆耳，汉武帝罢了不愿领命的庄参，改派立下豪言的韩千秋南下，会同南越太后之弟繆乐，带领两千人增援汉朝使团，却没有给驻扎桂阳的路博德军团下达最新指令。低估对手、舍近求远，大大偏离了既定方略，软的一手不够软，没有调和南越各派势力；硬的一手不够硬，无法对南越强硬派形成有效震慑，落实计划的“微操”一误再误，原来平定南越的策略无法落实，还错过了黄金救援期，激发了惊天变局。

不出意料，吕嘉集团发动叛乱，很快主导舆论，指责南越王室不顾百姓，并攻入宫中，南越王、太后以及汉朝使团全部遇难。韩千秋部几次小胜之后，轻兵冒进，在南越都城番禺附近遭受伏击，全军覆没。在付出惨重代价后，汉朝如梦初醒，催动十数万大军，挥师南下、势如破竹，吕嘉和赵建德都被擒获，南越国属下各郡县皆不战而降。胜利来之不易，所走弯路令人深思。

史 镜